

文章编号: 1005—0523(2006)06—0031—04

FDI 溢出效应: 国外理论研究回顾

姜 瑜^{1,2}

(1. 东北财经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25; 2. 江西财经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 许多东道国政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提供了各种激励, 其动机来源于对溢出收益的预期. 本文对国外有关 FDI 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进行了回顾, 目的是概括先前研究的主要成果, 发现现有文献中存在的问题, 并探讨未来的研究领域, 以期为国内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关 键 词: 外国直接投资; 跨国公司; 溢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 F01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近十年来, 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纷纷放松了对外国直接投资 (FDI) 的严格管制.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年度报告称, 2002 年在世界 70 个国家的 248 项有关的规制变化中, 有 236 项是有利于 FDI 的 (UNCTAD, 2003). 除了为 FDI 创造一个更加宽松自由的环境外, 各国政府 (甚至包括发达国家) 还提供相当可观的公共补贴以吸引内向投资.

为什么各国政府对 FDI 如此热衷呢?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来自以下预期: FDI 能为当地企业带来潜在收益, 并且这些收益能够超过当地生产要素外资所有权所导致的成本. 这里所谓的潜在收益即“溢出效应”, 是“当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进入和参与导致东道国当地企业生产率或效率收益, 而跨国公司又无法将这些收益的全部价值内部化时”发生的一种外部效应 (Blomstrom & Kokko, 1998).

目前, 国外学术界关于 FDI 对东道国经济影响的争论多集中于实证研究. 在理论上, 学者们普遍认同 FDI 溢出效应存在的合理性与重要性, 将其视作当地企业的一种重要收益, 一种推动东道国经济

增长的重要机制. 国内该领域研究近几年进展很快, 出现了不少较规范的计量经济学实证研究, 但理论与研究与国外相比差距还是较大. 有鉴于此, 本文对国外有关 FDI 溢出效应的代表性文献进行了评述, 希望对国内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2 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

经济理论提供了几种方法研究 FDI 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 一种方法源于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 最早可以追溯到 MacDougall (1960). 这是一种局部均衡比较静态的研究框架, 意在考察外国投资的边际增量是如何分配的. 该模型预言外国资本的流入——不管是 FDI 形式还是以证券资本 (portfolio capital) 的形式——都将提高东道国劳动的边际产出而降低资本的边际产出. 这里, MacDougall 首次提出 FDI 还可能与其它重要的潜在收益有关, 但是, 他并没有对这些不同收益的相对重要性进行分析. 另一种方法是从 Hymer (1960) 开创的产业组织理论出发, 而出发点是基于以下问题: 为什么要采取国外投资的方式来生产那些本来在国内就可以生产的产品? 答案很明确: “FDI 繁荣的一定是不完善的产品市场

收稿日期: 2006—02—20

作者简介: 姜 瑜 (1967—), 男, 江西南昌人, 工程师, 东北财大在职研究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或要素市场(包括后者中的技术),或者是政府(或公司)对竞争的一些干预,而这些干预造成了市场分隔。”(Kindleberger, 1969)。

上述二种方法相互之间并不排斥,它们只是强调了资本流动的不同方面。贸易理论主义者兴趣主要在于外国投资对要素报酬、就业、资本流动的直接效应,而研究产业组织方法的学者则更强调间接效应或外部性(Blomstrom & Kokko, 1996)。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先集中关注直接探究 FDI 与技术转移关系的产业组织理论方法,再回顾另一种间接考察 FDI 增长效应的增长理论方法。

1) FDI 溢出效应的产业组织理论

Hymer(1976)关于跨国公司的开创性研究将人们的眼光转移到跨国公司作为全球产业组织这一从前被人遗忘的角色,从而为突破传统的理论经济学迈出了关键一步。在 Heckscher 和 Ohlin 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中,严格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跨国自由流动且生产函数一致,以及科学和技术层面不存在国际差异,而在有关证券投资的新古典金融理论中,也只是简单地将跨国公司视为响应利差变化的资本套利者,并没有区分一国经济发展中证券投资与 FDI 资本流入所起的不同作用。Hymer 的主要贡献正是在于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此转移: FDI 不光只是资产的国际性交换,它还包含了国际性的生产,代表着比对东道国简单资本输入更丰富的内涵,是包括资本、管理、新技术在内的“一揽子”转移。

Caves(1971, 1974)和 Kindleberger(1984)将 FDI 的产业组织理论又作了进一步的延伸。他们强调偏离完全竞争的企业其行为是 FDI 的决定性因素。按他们的观点,为了在国外进行 FDI,跨国公司必须拥有一些超过当地潜在竞争者的特定的所有权优势,而技术先进性或拥有无形的租金产出性资产(如管理技能、品牌等)能够提供这种优势。相比只包含资本跨国流动的证券投资,FDI 需要各种资源的跨国界转移,包括生产程序、技术、管理技能、营销和分销诀窍以及人力资本等。忽略这其中的技术性因素可能会严重低估外国资本对接受国的实际作用。但是,以上早期研究既没有计算技术转移的收益与成本,也没有通过溢出效应明确地分析它们对东道国的影响。

率先对 FDI 与技术转移进行建模的是 Koizumi 和 Kopecky(1977)。他们使用局部均衡框架分析了从母公司到其分支机构的技术转移,假设技术转移是分支机构所拥有的该国资本存量的增函数。这里外

国技术的扩散被视为自动发生的,将技术当作公共物品来对待。研究结果显示:具有相同生产函数的两个国家可能沿不同的时间轨迹,达到不同层次的稳态均衡。分析还表明,一国储蓄率的提高可能减少外国资本,尽管有技术效率的作用,但最终还是减少它的稳态资本密度。

Findlay(1978)构建了一个模型以考察落后地区的 FDI 与技术变化之间的关系。落后地区的技术进步率是它与先进地区之间技术差距的增函数。因此,对于给定数量的外资参与,当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间的技术差距越大时,溢出效应也越大。此外,Findlay 秉承了 Arrow(1971)的观点,认为技术扩散可类比为流行病的传播(传染效应)。因此,当那些拥有创新知识的人与那些后来采用它的人之间存在个人联系时,技术创新可以最高效地扩散。

Das(1987)利用寡头垄断理论中的价格领导者模型,分析了从母公司到其分支机构的技术转移。该模型假设当地企业间的效率增长是外生的;同时,还假设当地企业的效率增长率与跨国公司分支机构的运作层次正相关。他模拟了当地企业从这种“边看边学”(learning from watching)中获取的收益对跨国公司造成附加成本而使其面临的选择问题。沿最优化路径,他得出以下结论:尽管在东道国存在知识泄漏,但分支机构还是从其母公司的技术转移中获益。因此,虽然当地企业能从中获益,但对分支机构而言进口更先进的技术还是值得的。

Wang 和 Blomstrom(1992)发展了一个模型,假定跨国公司的国际技术转移通过分支机构与东道国公司以相互作用的方式内生地发展。

通过解决动态最优化问题, Wang 和 Blomstrom 发现:(1)从母公司到分支机构的技术转移与当地企业学习投资的水平和成本效率正相关。(2)分支机构的贴现率越低,技术转移越快;而当地运作风险(如政治不稳定或经济低靡)越高,跨国公司越不愿意转移技术。(3)在不考虑分支机构积极的学习努力的情况下,某些与技术差距大小成比例的技术转移总是会发生。从母公司到分支机构技术溢出的成本越低,技术转移越快。

2) 增长理论框架中的 FDI 溢出效应

在 Solow(1956)类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实物资本的报酬递减,技术变化是外生的,FDI 不能影响长期增长率。在不考虑要素国际性流动的情况下,该理论预言具有相同选择与技术的国家将向同一收入水平和某一渐近的增长率收敛。而在要素流动

的情况下,这种趋势将得到强化.资本会从那些资本丰裕的国家流向资本稀缺的国家.因此,各国资本劳动比率与要素价格的长期均衡将表现为同一均等.

八十年代中期出现的新增长理论使人们的认识突破了早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当作外生过程对待,将资本累积作为增长源泉,而新增长理论关注的是技术性知识的创造与传播问题.它将创新与模仿努力视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因此,它强调的是R&D、人力资本积累和外部性的作用(Grossman & Helpman, 1991; Lucas, 1988; Romer, 1990).

关注的是规模经济如何与自由的资本流动相互作用.他注意到,在资本存量所导致的外部性模型中,资本累积可能存在集聚效应(agglomeration effects).但是,他将跨国公司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等同看待,这种处理方式就显得有些粗糙了.Helpman(1993)自己强调对于经济增长,需要更全面地看待跨国公司.

Walz(1997)将FDI引入一个内生增长模型,而跨国公司在该模型中对经济增长与专门化模式起着关键作用.他吸收了Grossman和Helpman(1991)中与贸易有关的国际知识溢出的思想,并将它运用到FDI.跨国公司在低收入国家的生产活动改善了当地潜在的创新效率,同时这些活动的知识溢出使得创新在低收入国家有利可图.考虑到欠发达国家的模仿行为,间接通过FDI的技术转移为当地的R&D和经济增长提供了激励.因此,他预言促进FDI的政策将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

3 简要评述

在Koizumi和Kopecky(1977)、Findlay(1978)和Das(1987)的模型中,实际上认为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先进技术是公共物品,同时被自动转移.然而事实上,国际专利协议与技术许可证已受到日益重视,这表明技术性知识应该是私人物品而不是公共物品,而且技术也极少是被自动转移的.Wang和Blomstrom模型的贡献在于突出了竞争性的东道国企业在提高跨国公司技术转移速度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和当地企业都能通过其各自的投资决策来影响技术转移的程度.

仔细观察后我们可以发现以上模型存在一些共同点.国际技术转移显然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从跨国公司母公司到它的国外分支机构,二是以外部性形式从分支机构到东道国当地企业.几乎所有模型都将注意力集中在前一阶段,而认为后一阶段的技术转移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已经有人(Das, 1987; Wang & Blomstrom, 1992)发现了其中可能存在问题.在这些模型中,已经将东道国的生产效率明确表达成外国资本参与的增函数.此外,所有模型均沿用了Gerschenkron(1962)的假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差距越大,技术模仿的潜力也就越大.

相比贸易与经济增长间关系所进行的大量理论研究,FDI与增长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以这种关系在实证研究上的重要性,这种忽略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使用增长理论研究框架的模型同样只是关注从跨国公司母公司到其分支机构的技术转移,而从分支机构到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则假定为与FDI的东道国参与成比例.这类流行病式扩散模型其可取之处在于允许研究者将扩散速度与FDI流入数量相联系,但从分支机构到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会自动发生这种假设的有效性却值得怀疑(Fan, 2002).但总的来说,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还是为研究FDI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方式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4 未来展望

近几年来,国外在FDI东道国溢出的实证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理论研究却似乎显得有些停滞.这可能与国外学术界目前推崇实证有关,当然也不能排除发表偏倚(publication bias)的问题.但事实上,今后如果想在实证领域进一步深入的话,那么相关理论研究必须有所突破,否则只能算统计技巧上的改进罢了.正如前文所见,未来该领域还有大量理论问题亟待解决.

目前理论研究主要关注于从跨国公司母公司到其分支机构的技术转移,而假定从分支机构到当地企业的溢出效应是自动发生的.确实许多实证结果证明了这种溢出效应的存在,认为FDI能够作为将新观念、新技术和工作实践转移到当地企业的一种媒介,然而也有一些研究未能发现FDI溢出效应存在的依据.实证结果的不一表明溢出收益不应该被假定,而是有必要研究确定溢出效应实际发生的条件.

此外,多数理论研究都秉承了Gerschenkron(1962)的假设,但大量实证依据表明这个假设可能

不成立,它们显示当跨国公司分支机构与当地企业间的技术差距适中(或者说后者达到了某一最低门槛要求)时,溢出最有可能发生.前提假设的不可靠也就意味着至少理论上应该进行修正.

而在增长理论的研究文献中,FDI 与经济增长间关系探讨较少.考虑到这种关系对于实证研究的重要性,今后还需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因为已经有实证研究表明,FDI 与经济增长间可能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Kholdy, 1995);如果确实的话,目前实证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单一方程 OLS 模型就值得怀疑了.此外,对于诸如 FDI 与溢出之间的关系,FDI 与当地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 FDI 对促进增长的作用等问题的研究也需要进一步深入.

参考文献:

- [1]Blomstrom M. and A. Kokko.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Spillovers[J]. Jouranal of Economic Surveys. 1998 12(2): 1—31.
- [2]Das, S. Externalitie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through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 Theoret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7 (123): 188—206.
- [3]Fan, Emma Xiaoqin, 2002. Technological Spillovers from For-

eign Direct Investment —— A Survey, ERD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3 Economics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4]Findlay, R. “Relative Backwardness,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A Simple Dynamic Model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8(92): 1—16.

[5]Helpman, E. Innovation, Imit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J]. Econometrica 1993(61): 1247—1280.

[6]Hymer, S. H., 1976.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1960). MIT Monographs in Econom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7]Koizumi, T., and K. J. Kopecky, 1977. Economic Growth, Capital Movemen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Technical Knowledg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7 (7): 45—65.

[8]Lucas, R. E.,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1): 3—42.

[9]Romer, P. M., 1990.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71—102.

[10]Walz, U., 1997. “Innovati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rowth.” Economica 64: 63—79.

[11]Wang, J. —Y., and M. Blomstrom, 1992.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a Simple Model.”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6(1): 137—155.

Theoretical Studies on the Spillover Effect fro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Review of Foreign Literature

JIANG Yu

(1.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2.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Many host governments offer significant inducements to attract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otivated by the expectation of spillover benefits. This paper surveys the foreign theoretical literature on technological spillover effect from FDI. Its purpose is to summarize the main findings from previous research, identify the remaining issues in existing studies, and discuss the area for future research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of lessons for domestic researcher conducting related studies.

Key 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MNCs); spillover effect